

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 是如何召开的

——忆“七千人大会”的筹备和保障工作（下）

张素华

（一）

上期我给大家介绍了“七千人大会”的召开背景及筹备工作的初步情况。的确，在当年经济那样困难、条件那样艰苦、各方面设施那样落后的情况下，安排上万人的吃、住、行和各项活动，这是多么巨大的“工程”。即使是在今天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那么，对当年会议的保障服务工作，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满意吗？他们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们先听听湖南一位县委书记的回忆：

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，州里来了个电话通知，说要梁敏政同志和我安排收拾一下，准备去北京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。赶到州里，各县（市）委书记和副书记陆续报到了。第二天，州委书记齐寿良同志和州长石帮智同志带领我们乘车前往省会长沙，与其他地区的同志汇合在省委接待室，然后乘火车赶赴北京。列车运行一天一夜，到达了北京站，几十辆大客车将我们接到西郊友谊宾馆。友谊宾馆原是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地方，建筑风格很独特，服务设施也堪称一流。我们自建国前参加革命起，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到过北京，更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宾馆，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服务员领着我们龙山、桑植、永顺三县6名代表来到一个大套间，大家雄赳赳、气昂昂地一路跟着，王建阁同志大大咧咧地走在头里，刚迈步进入房间客厅的门，他就摔了一个仰八叉。“他娘的，滑溜溜的，像溜冰一样！”大家愣了几秒钟，便捧腹大笑起来。原来是地上打了蜡，很光滑的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我们后来者便小心翼翼地拖着小步进门，那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神态，逗得服务员也忍不住笑。

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回忆。他住在西颐宾馆，两个人一个房间，住得很宽敞，也对住宿条件表示满意。

那么这次大会吃得怎么样呢？据参加会议保障的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张文奇说：

当时经济比较困难，会上吃饭是一件大事。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节俭的，10人一桌，大锅菜，不管你是中央领导，还是一般工作人员，都一样。即使是少奇同志去安徽组开会，吃饭时也和大家一样，凭就餐券吃饭。10人一桌坐满才上饭，坐不满不行，餐券丢了也不行。

像我们安全保卫组为了保证会议供电，保证食品安全，有时把供电局的工程师、负责人，还有供应食品的人找来开会，每到吃饭前就赶紧散会，不然没有办法管人家的饭。有的时候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就把自己的饭票给人家，然后自己回家吃饭。

做保卫工作的，每个驻地警卫组也就一两个人属于在编人员，大会管吃管住。不在编的，大会不管饭。结果弄得内部同志也有意见，同做一样的工作，为什么你在编，我就不在编，就不能在会上吃饭呢？实在是编制有限呀，前门饭店来来回回的那么多车辆，就3个警察可以在会上吃饭，剩下的统统自己解决。大会规定的工作组就这么多人，超过是不行的。

每次吃饭，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，四菜一汤。为了节约，都是大锅菜，大家连菜带汤一起吃。就这样各个饭店都叫苦，要达到中央规定的标准，做不出来，还得往里贴钱，所以炖菜多，不过县委书记们高兴，比他们在家里吃得好。

河南鲁山县委书记杨国殿回忆说：“毛主席说的两干一稀是，早晨是稀饭，有时也有干的；中午

四菜一汤，晚上稍差一点，也属四菜一汤吧。由于我们来自重灾区，所以尽管我们是县委书记，在家里也是填不饱肚子，现在来开会，比在家里吃得好多了，可以吃上米饭、馒头。你问能不能吃饱？能够吃饱，但每次吃完饭，桌子上是光光的，不论副食还是主食，都是光光的。开了近一个月的会，只是在春节那一天，中午吃顿饺子，每张桌子一瓶酒。其他没有了。平时能够吃到一点肉，但不是很多。”

(二)

“七千人大会”的特点是规模大、时间长，还对外保密，那么当时的保卫、保密工作是如何做的呢？

关于对外保密的情况，据张文奇介绍，“七千人大会”对外是不宣传的，实际上是一个内部会议，所以保密工作非常重要。这么多人，时间又这么长，不可能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。北京饭店是各个工作组的大本营，各大区书记都住在这里，大会的工作班子也设在这里。另外北京饭店还有加纳、叙利亚、马里、阿尔及利亚4家外国使馆。

那时不大了解外国人如何搞情报，说人家拿一个大头针往电话线上一扎，就可以窃听。北京饭店又是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，他们吃饭、会客、理发……进进出出的不少人，你也不能因为开会，就不让人家来吃饭、理发吧。所以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很重。为了防止外国人搞窃听，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些这方面的技术专家来检查，看看会不会泄密。最后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，据说外国还是知道了中共有很多高级干部聚在北京开会，但会议内容他们不知道。友谊宾馆还有30多个外国专家，附近还有一所苏联孩子读书的中学，但都没有出现泄密事件。

关于国内的情况，张文奇说：

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，因为浮肿、饥饿、死人，群众心情不舒畅，很多人的怨气还比较大，所以保卫工作既要防止敌人破坏，又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。好在那时交通、通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，境内外也没有什么联系，没有搞什么恐怖活动的。虽然有不满意情绪，但矛盾不像现在这样突出，老百姓还是听话的。经过动员，群众的积极性就很高。

所以保卫工作的特点是，当时并不担心敌人来搞什么破坏，主要是怕一些设备出问题。因为我们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都不行，比如北京饭店，说是两路供电，其实线路的质量很差，其他饭店都是一路

供电，唯恐哪一处线路短路，造成停电，影响会议的正常进行。再比如吃饭，怕食物中毒，或者闹病什么的，使会议代表心里不高兴。要说“七千人大会”的保卫工作很紧张，是紧张极了，不过那个紧张，主要是紧张这些问题。比如，每时每刻都要了解各个驻地的线路情况，供电问题，还有锅炉问题。像人民大会堂，下面很好看，但上面都是木质结构的，每次开会都有几个人在上面看着，怕木头被电烤热烧着了。人民大会堂的木质结构，直到国庆35周年才换成了钢质结构。

整个大会期间，没有发生断电情况，也没有用过蜡烛。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事故，非常顺利。这次会议完了之后，公安部召开全国警卫工作会议时，让北京市公安局代大会起草文件，要求把北京市做好“七千人大会”安保工作的经验糅进去，要求全国都要向北京一样做好这项工作。

(三)

这次连同工作人员在内有上万人参加的大会，每次集会，都要动用很多车辆。与会者乘的是什么车？当时的北京市有那么多车吗？

据张文奇回忆，由于大会组织得比较好，虽然用车量很大，但总体上是一路畅通、有条不紊的。开大会时的用车高峰一次是800多辆车。当时的北京有两家汽车运输公司，一个是首都汽车运输公司，一个是友谊汽车运输公司。大会用车主要是租首都汽车运输公司的车。

从乘车情况来说，省委书记以下统统坐大车，中央局以上的领导才坐小车。个别身体不好的同志，或领导找谈话赶不上坐大车的派小车。

开大会时，没有用过开道车。这次会议的日程不像现在许多会议那样，都是事先定好的，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，因此也无法把所有的车辆都准备好。那怎么才能做到既准时又安全地把上万人送到会场呢？工作人员编了一个顺口溜：时（间）不够分路（走）；（道）路不够分时（走）；路、时都不够，断一条路，也就是说让社会车辆暂时停一下，把会议代表先放过去。

为了交通安全有序，交通部门事先对抽调来的司机进行集中培训，对怎么走，走哪条线，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，都交代得非常清楚，让这些司机师傅烂熟于心。

散会后，大会会务组要求，停在人民大会堂前

的车 20 分钟之内必须疏散完毕。后来，最长的才用了 18 分钟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采取了两个办法：一是事先同会议代表说好，原地上下车，以便于散会后找车；二是考虑到大多数代表没有来过北京，不容易找到车子，于是做了一些牌子，上面写着中南局、西北局之类的字，在车前等候或引导代表上车，晚上还打带灯的牌子。由于工作做得很细致，所以代表们都能迅速上车，快速疏散。

开大会时基本没有影响社会车辆，也没有因为车辆调配不好耽误了什么事情，更没有影响会议的进行，除了几次小车刮蹭，没有出现大的交通事故。那个时候汽车的质量是很差的，但也从未出现抛锚的情况。因此“七千人大会”的交通管理工作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。

通过当事人的回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“七千人大会”的筹备工作，虽然时间短、任务重，但是大家以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，安排得井然有序，非常到位。会议时间虽长、又处在困难时期，但是大家同心协力，保障了“七千人大会”的顺利进行。以当时极端落后的物质条件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

(四)

由于不断变更会议议程，原定只通过一个主报告的“七千人大会”的会期被一再延长，竟然开了将近一个月。这样，原来许多准备在春节前返回各地的会议代表只好在北京过春节了。

七千多名中共县级以上干部，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干部云集北京过春节，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。这里再简单回忆一下代表们在当年春节期间的活动

是如何安排的。

2月4日，除夕那天晚上，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。北京市委第一书记、北京市市长彭真以东道主的身份，主持春节联欢晚会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董必武、陈云、林彪、邓小平等均来助兴。当他们出现在主席台上时，全场欢腾，发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，向中央领导同志祝贺春节。

正月初一晚上，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拥政爱民联欢晚会，有4万多人参加，规模之大令人咋舌。据周总理讲，这次晚会他本不想惊动毛主席，但在晚会开始前一小时，想来想去，还是要和毛主席说一声，结果毛主席当即表示他要参加。周总理由此得出结论，毛主席总是愿意和群众在一起的。因为毛泽东的出席，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部出动。1962年2月6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对此作了报道：“8时整，毛主席、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，向大家祝贺春节。这时，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，欢呼‘毛主席万岁！’”事隔45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心情，感受他们的情绪。在贫穷和困难之中，人们的情绪是饱满的，他们对党、对毛主席充满着热爱和信赖。

“七千人大会”的全体代表都出席了除夕和初一晚上这两次联欢活动，但当时的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参加联欢的事情。“七千人大会”是悄悄进行的，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北京市民，不知道这个春节还是全中国政治精英的一次大团聚。

2月6日，正月初二。全体与会人员乘坐着统一安排汽车，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来到人民大会堂。春节，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阖家团圆的节日，尽管处在困难时期，北京和天安门的许多建筑物上还是张灯结彩，红旗飘扬，爆竹声在噼啪作响，充满着节日的欢乐气氛。天公也作美，初二这一天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最高气温达9℃，也为人们的心里增添了几分暖意。

这一天，“七千人大会”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。会议仍然由毛泽东主持，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讲话，他专门讲党的建设问题。

2月7日，正月初三。具有历史意义的“七千人大会”悄然闭幕。

(全文完)

(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)



毛主席和周总理在“七千人大会”上